

北大高等教育文库·大学之道丛书（第二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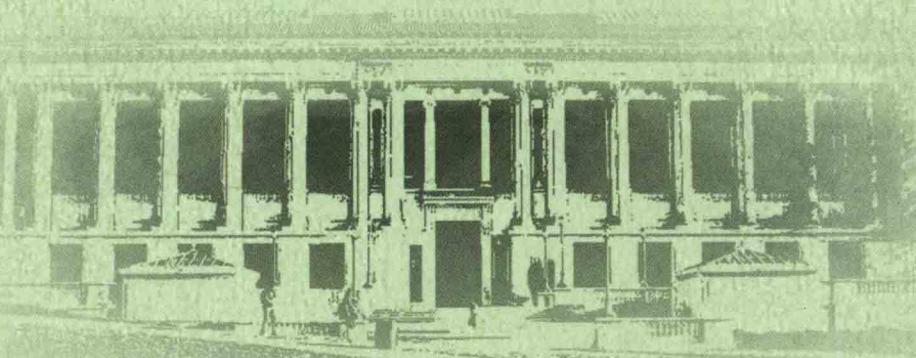


THE IDEA OF THE UNIVERSITY  
A Reexamin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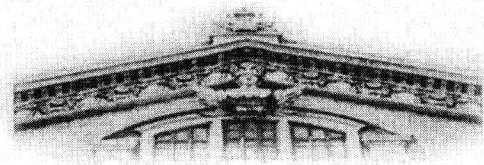
# 大学理念重审

与纽曼对话

[美]雅罗斯拉夫·帕利坎/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THE IDEA OF THE UNIVERSITY  
A Reexamination

# 大学理念重审

与纽曼对话

[美]雅罗斯拉夫·帕利坎/著

杨德友/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01 - 2006 - 215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学理念重审:与纽曼对话/(美)雅罗斯拉夫·帕利坎著;杨德友译.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0

(北大高等教育文库·大学之道丛书)

ISBN 978 - 7 - 301 - 13167 - 1

I. 大… II. ①帕… ②杨… III. 高等教育 - 研究 IV. G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85235 号

Jaroslav Pelikan, THE IDEA OF THE UNIVERSITY—A REEXAMINATION

Copyright © 1992 by Yale University

书 名: 大学理念重审:与纽曼对话.

著作责任者: [美]雅罗斯拉夫·帕利坎 著 杨德友 译

丛书策划: 周雁翎

丛书主持: 周志刚

责任编辑: 周志刚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301 - 13167 - 1/G · 2261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址: <http://www.jycb.org>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zyl@pup.pku.edu.cn

电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7346

出版部 62754962

印刷者: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商: 新华书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16 印张 190 千字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5.00 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 - 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 献词



谨以此书献给  
芝加哥大学建校百周年  
1892—1992

增进知识，优化生活  
(*Crescat scientia, vita excolatur*)

# 前　　言



本书虽然采用了纽曼式的标题“大学理念重审”(The Idea of the University—A Reexamination),本书本来也是可以把他的另外一部著作当作楷模而自称“生平辩护”(*Apologia pro Vita Sua*)的,因为从几个方面来看,它都是一部关于我如何定义我的职业的个人性的论著,也是我如何定义大学的一本专论。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一部关于我所体验过的大学的论著,正如纽曼谈论的是他在牛津和都柏林的大学经验,我的体验涉及的是我从精神上所受惠的德国大学,以及后来我个人在芝加哥大学和耶鲁大学的生活和工作。但是,正如我的注释和书目资料所显示的那样,我通过参考过去和现在的、大量见证人的经验,补充、深化和修正了我的(和他的)经验。

本书的缘起要感谢耶鲁大学校长施密特(Benno C. Schmidt, Jr.)的邀请,他请我在1990—1991学年举办一个题为“大学的未来”的系列公共演讲和研讨班。此次活动是准备庆祝耶鲁大学建校三百周年系列活动的开端,结果我成功地邀请了多位同事对单个演讲作出回应,并根据他们的回应作了广泛的修订。这些同事是:阿贝尔(Milliecent D. Abell)、卡拉布莱西(Guido Calabresi)、卡干(Donald Kagan)、波利特(Jerome J. Pollitt)、莱登(John G. Ryden)、施密特(Benno C. Schmidt, Jr.)、西奥多(Eustace D. Theodore)、威灵顿(Sheila W. Wellington)和伍德萨姆(H. Edward Woodsum, Jr.)。我十分感激莱登、都利(Laura Jones Dooley)和希利(Timothy S. Healy)所给予的编辑指正。

国际听众的批评、评论和提问也使我受益匪浅；接连好几年，我对他们发表了一次或者更多次的演讲。他们的所在地为：阿拉巴马大学、美国大学出版社协会、研究资料图书馆协会、芝加哥大学、斯洛伐克共和国布拉迪斯拉发夸美纽斯大学、艾莫里大学、乔治城大学、高级研究院、国会图书馆、麻省理工学院、图兰大学、史密斯索尼安研究院威尔逊中心、英国约克大学。国家人文学科基金会主席切尼 (Lynne V. Cheney) 的一笔研究资助、卡耐基教学促进基金会会长博耶尔 (Ernest L. Boyer) 邀请我担任高级研究员 (Senior Fellow)，使我有机会详细阅读有关大学的文献。有些读者可能知道，我曾研究过这些问题当中的某几个，因为这些问题刚好属于《学术及其生存》(*Scholarship and Its Survival*) 中的“研究生教育理念”，这本书是我在充任上一届卡耐基教学促进基金会高级研究员期间写成，并于 1983 年由该基金会出版的；这些问题也存在于我此前和此后为各种场合写作的其他文章之中。我已经改变了对某些问题的见解，强化了原来关于另外一些问题的观念，因而我觉得可以自由地脱离这些讨论并使用它们，而不必每一次使用都特别指明出处。

贯穿本书，我始终在与另外一本书进行对话：约翰·亨利·纽曼的《大学的理念：界定与诠释》(*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Defined and Illustrated*)：I. (1852 年) 对都柏林天主教徒的九次演讲；II. (1858 年) 对天主教大学成员所作的演讲和论文 (I. T. Ker 编辑、作序和加注，牛津：克拉兰顿，1976)。这部著作还有其他几种版本可资使用，为了方便使用其中某一种的读者查阅我的引用章句，我在正文中用括号标记出了该书的卷 (I 或者 II)、演讲 (用小写的罗马数字) 和段落 (用阿拉伯数字)。在引用这部著作和纽曼的其他著作的时候，我都保留了原来标点和大写字母 (不统一的) 使用法。

献词表达了我对母校的忠孝之情 (*filial piety*)，因为母校在大学理念方面给予了我教导，而且在相隔了整整 45 年的两个场合，分别授予我博士头衔。

# 目 录



前言 .....	1
----------	---

## 第一卷

第一章 与约翰·亨利·纽曼的对话 .....	3
第二章 风暴冲击大学:危机中的大学 .....	12
第三章 返回基本的原则 .....	24
第四章 知识本身就是目的吗? .....	36
第五章 至高无上的智性及其美德 .....	49
第六章 科学的和睦家庭大厦 .....	62

## 第二卷

第七章 大学的职责 .....	75
第八章 通过研究推进知识 .....	82
第九章 通过教学推广知识 .....	94
第十章 从与专业技能的关系上考察知识 .....	105
第十一章 为已故的天才防腐? .....	117
第十二章 通过出版传播知识 .....	130



## 第三卷

第十三章 社会义务 .....	147
第十四章 大学是未来的应许之地 .....	158
第十五章 大学与革命学说的传播 .....	170
第十六章 开创自我改革工作的任务 .....	180
第十七章 母校：学习生涯 .....	193
第十八章 学术文献中的大学理念 .....	203
参考文献 .....	214

# 大学理念重审：与纽曼对话

## 第一卷

- 
- 
- 第一章 与约翰·亨利·纽曼的对话
  - 第二章 风暴冲击大学：危机中的大学
  - 第三章 返回基本的原则
  - 第四章 知识本身就是目的吗？
  - 第五章 至高无上的智性及其美德
  - 第六章 科学的和睦家庭大厦

# *THE IDEA OF THE UNIVERSITY*

## *A Reexamination*

### *• Part I •*



1. In Dialogue with John Henry Newman
2. The Storm Breaking upon the University:  
The University in Crisis
3. Pushing Things up to Their First Principles
4. Knowledge Its Own End?
5. The Imperial Intellect and Its Virtues
6. The Mansion-House of the Goodly Family  
of the Sciences

# 第一章 与约翰·亨利·纽曼的对话



对于任何关注大学理念重审,或者从总体上关注大学内外学术重审的人士而言,“杰出的维多利亚时代人士”(借用琳顿·斯特莱奇—Lytton Strachey 1918 年的一个著名标题)写作的至少有两部著作大概应该成为正典的组成部分。第一部的作者是位女士,而第二部的则是位先生,它们分别是: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的《米德镇的春天》(*Middlemarch*)<sup>①</sup>和纽曼的《大学的理念》。近期的一项研究描述了“在 20 世纪 70 年代,对《米德镇的春天》的讨论异常丰富”的前后过程;这些讨论指向“通过浪漫爱情得到拯救的一个幻想世界,以及通过社会忠诚得到拯救的公众世界”。这项研究宣告,这一过程造成的结果就是,在整个这一时期,“艾略特典范之作中最核心的和最引人入胜的小说就是《米德镇的春天》”。<sup>②</sup> 作为一个描写学者们的故事,这本小说也同样是核心的和引人入胜的,虽然直到最近这个故事都没有得到这样的使用。在艾略特对爱德华·凯萨本(Edward Casaubon)“这个学究气十足、毫无生气、有抱负却胆小、十分细心但是目光模糊的人”<sup>③</sup>的描写中,就像埃尔曼(Richard Ellmann)一度指出的那样,她给予我们的是一个“形同撒哈拉沙漠那样贫瘠的学究,所以人们常常忍不住想要去鉴别他”,不过有关谁是小说中这个人物的历史原型(或者几个原

① Eliot 1871—1872 (Hornback 1977); see Haight 1968, 420—455.

② Showalter 1990, 72—75.

③ Eliot 1871—72, III, 29 (Hornback 1977, 193).



型)的问题,在学者中间还缺乏一致的见解。<sup>①</sup> 可以很有把握地说,艾略特笔下凯萨本的肖像乃是全部文学中对学究们最令人战栗的刻画,就像瓦格纳(Richard Wagner)在《纽伦堡的名歌手》(其创作比《米德镇的春天》早10年)中把他的批评家汉斯利克(Eduard Hanslick)丑化成为西克斯图斯·贝克梅瑟(Sixtus Beckmesser)那样,这个肖像立即成为最滑稽、也最悲凄的形象之一。关于凯萨本,艾略特评论说:“人类普遍生活在她身上激发出来的这种思考和感受的能力,早已经萎缩成为某种枯燥的备课,成为知识的毫无生气的防腐剂。”<sup>②</sup>或者,用小说中另外一个人物对她的评论:“他做梦也想着注解,注解都随着他全部的智慧流失了”;还有,她的“学问是一种毒气”,一种思想的霉菌。<sup>③</sup>更令人震惊的是,比如发现这个书呆子成年以后一直不停地积累研究笔记,要写作一本篇幅浩繁、但是绝对没有办法出版的《万国神话详解》——对于弗雷泽(George Frazer)的《金枝》的某种预先讽刺——却又因为不能阅读德语文献而受到阻碍。<sup>④</sup> 然而,在整个18和19世纪,有关这些论题的绝大部分的重要学术著作都是用德语写作的,艾略特当然熟知这一事实,因为她自己就熟练地、然而匿名地将施特劳斯(David Friedrich Strauss)篇幅巨大的、主张偶像破坏的《耶稣传》翻译成了英语。<sup>⑤</sup> 对于以后一切领域中世世代代的学者而言,《米德镇的春天》作为一个具有训诫意义的故事,肯定将会继续发挥作用。

艾略特在1864年第一次阅读纽曼自传体作品《生平辩护》时,称这本书是“对于一种生活的揭示——这种生活在形式上十分有别于自己的一生,但是在需求和负担方面与自己的一生具有紧密的情谊——我指的是精神的需要和负担”<sup>⑥</sup>。她似乎完全是在描写爱德华·凯萨本——虽然必须承认她那个时代,还有我们时代的大学肯定也提供出

① Ellmann 1973, 19.

② Eliot 1871—1872, II. 20 (Hornback 1977, 136—137).

③ Eliot 1871—1872, I. 8, III 28 (Hornback 1977, 4, 192).

④ Eliot 1871—1872, II. 21 (Hornback 1977, 144).

⑤ Haight 1968, 52—59.

⑥ George Eliot to Sophia Hennell, 13 July 1864, Haight 1954—1978, 4: 159.

了同样予人印象深刻的大量范例——对于这种“知识的毫无生气的防腐剂”，纽曼有很多尖刻的评论。纽曼在 1854 年的一次讲演中引证过一个的人物——这个人物不是来自艾略特的小说，而是来自司各特 (Walter Scott) 爵士(在青年时代的一封书信中，纽曼有点过度热情地称司各特为“莎士比亚第二”<sup>①</sup>)，并谈到此人的“科学学究作风”：“被禁闭在自己的博学之中，或者在博学中变成化石”(II. iii. 2. 2)。更早些时候，在《大学的理念》中，他甚至更为辛辣地写道：“有些作者虽然文献知识无限渊博，但是完全不得要领。他们凭体积衡量知识，似乎知识就在大块的粗木料之中，不讲对称，不讲设计……这样的教师也不过是被知识附体，而不是主动把控知识。”和形形色色爱摆架子的人不一样，他警告说，可能被过高估价的不仅是想象力及其“贫瘠的幻觉”，而且还有记忆力及其“贫瘠的事实”。纽曼痛苦地评论说，这样的情况一旦出现在饱学之士身上，“就像在狂人身上一样，理性的作用变得羸弱而衰颓；他们一旦开始任何一个论题，就丧失了所有的自控能力；他们消极地忍受来自原初催人兴奋的事物的变化不定的冲动；他们从一个思想走向另一个思想，稳步前进，虽然听众作出最大让步，他们还是沿着一条思路迈出沉重的步伐，或者离开这条思路没完没了地离题万里，对听众的抗议根本不予理睬”(I. vi. 7)。如果他当时知道现在美国的来自石油勘探的一个比喻的话，他一定会拿来补充说明的：“等一会儿，如果你还掘不到油的话，就不要钻井了！”

纽曼于 1801 年 2 月 21 日出生，1890 年 8 月 11 日逝世，他的一生几乎跨越整个 19 世纪。在这里我不准备讨论他对基督教教义发展史的重大意义，我的其他著作已经探讨了这个问题。就现在的论题而言，关于纽曼的最重要的情况是，正如他在 1863 年的日记中所写的那样，“从起初到最后，教育……一直是我的本行”<sup>②</sup>。1817 年，他刚满 17 岁，就来到牛津大学，在那里生活了几乎 29 年，起初是三一学院的一名本科生，然后是奥里尔学院院士，接着成为奥尔本堂 (Alban Hall) 的

① Letter of 21 January 1820, quoted in Culler 1955, 18.

② Quoted in Tristram 1957, 259.

副院长，最后担当牛津大学圣玛丽教区的牧师。1845年10月，纽曼皈依罗马天主教，这一变化迫使他于1846年2月23日在痛苦中离开这个地方；而他在《生平辩护》中说，他曾预期这个地方就是“永久居住之地，直至终老”<sup>①</sup>。他前往罗马去接受圣职（亦即，再次接受），然后建立了圣菲利普·内里的奥拉托里会的英国分会。

纽曼写作《大学的理念》的历史背景，在纽曼的每一部传记里，在几种现代版本全集的序言里，在至少两部专著里，都得到了描写。<sup>②</sup> 正如一位传记作者所指出的：“涉及在都柏林建立天主教大学所发生的事，大概构成了纽曼生涯中最为令人震惊的情节。肯定也是最为耗费精力的情节。”<sup>③</sup> 应该建立一所爱尔兰天主教大学的设想，正好回应了被牛津和剑桥录取入学的爱尔兰罗马天主教平信徒所遇到的困境。1851年，阿尔马的保罗·库伦（Paul Cullen）大主教开始在都柏林创建“爱尔兰天主教大学”，这时候，有人告诉他，要想行动，理所当然的要务就是“首先聘请纽曼”；1851年7月18日，大主教拜访了纽曼，聘请他当校长，纽曼欣然接受。1858年11月12日，纽曼提出辞职，因为公务负担以及他与爱尔兰教士团、特别是库伦大主教的关系已经变得让他无法容忍。纽曼牢骚满腹：“他一事不做，我给他写的书信，他都抓起来，揉成一团，投进火炉，从来不动笔作复。”<sup>④</sup>

但是，公正地说，纽曼担任大学行政人员的令人失望的经历至少也产生了一个重要而积极的结果。为了开办爱尔兰天主教大学，从1852年5月10日起，这位新校长发表了一系列的演讲，而这些演讲，经过各种修改和补充，后来变成了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这部《大学的理念》。因此，介绍现在这一部《大学理念重审》，恰当的方法就是使用纽曼自己在介绍这一论题的第一篇演讲时所说的话：“先生们，在探索现在已经引起很大兴趣并引发出许多讨论的一个问题，亦即大学教育问题的这一场合，我觉得我应该做出某种解释，换言之，在对于这个问

① Newman 1864, IV (Svaglic 1967, 213).

② McGrath 1951 and Culler 1955, 156—170.

③ Bouyer 1960, 300.

④ Quoted in Ker 1976, xxvii.

题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和积累了广泛的经验之后,我依然认为,每一个领域依然期待着争论者或者探询者再接再厉的探索努力。”(I.i.1)。

这句话是在几乎一个半世纪以前的1852年说的,从那个时期以来,“引发出了”更多的对大学的“讨论”,讨论的大部分——而绝对不是全部——都是纽曼所说的“大量的精力和广泛的经验”(或者,也许是在某些情况下,至少是这两种品格之一)。因此,和19世纪中期比较,在20世纪末,情况更是某一个人应该“做出某种解释”,这个人似乎可以认为“每一个领域依然期待着争论者或者探询者再接再厉的探索努力”,而这样的“努力”,例如本书,甚至与其说是来自一位争论者,远远不如说是来自一位探询者。

但是,在今天,任何人,探询者也好,争论者也好,大概都没有必要通过与纽曼的《大学的理念》展开对话,为大学的讨论提供某种解释或者答辩(或者,就像纽曼很可能喜欢说的:辩护)。对于这位作者的颂扬,以及对于这本书长盛不衰的重大意义的颂扬,听起来就像是在回应出版商写在封面简介上的夸赞之词。“完美地阐述了一种理论”,这是另外一位杰出的维多利亚时代人士裴特(Walter Pater)对该书的评价。<sup>①</sup>吉勒-考奇(Arthur Quiller-Couch)爵士(以编辑1900年第一版的《牛津英国诗歌集》而著称)说:“在本世纪的所有著作中,翻阅和思考这本书所受之益,恐怕是无与伦比的。”<sup>②</sup>科麦隆(J. M. Cameron)认为,“对于大学教育的现代思考,其实就是对纽曼演讲和文章的一系列的注解”<sup>③</sup>。在以英语为母语的世界及其外部,关于大学论题的近期著作,都对纽曼顶礼膜拜,在自己的标题中对他的这部著作作出反响。<sup>④</sup>巴赞(Jacques Barzun)不应该因为过度赞赏纽曼的神学而受到谴责,不过他确实谈到了“大学生活的最伟大的理论家,红衣主教纽曼”<sup>⑤</sup>,但此后再也没有提及他的名字。斯密斯(Page Smith)在近期关于大学

① Pater 1913, 18.

② Quoted in Svaglic 1960, vii.

③ Cameron 1956, 24—25.

④ Brubacher and Rudy, 1958; Jaspers 1959.

⑤ Barzun 1968, 210; but see 76—77.

的评论性著作中从纽曼那里为自己的一章选取题词（另外一章的题词来自夸美纽斯——John Amos Comenius），但是同样也没有再提及他的名字。<sup>①</sup> 纽曼的著作甚至有资格被收入迪利（Francis X. Dealy）的论著《不惜一切代价取胜：出售大学体育运动》的书目，但是，这本著作几乎完全是以访谈而非以纽曼的这类论著为依据的。<sup>②</sup>

沙斯特（George N. Shuster）在《大学的理念》1959年版的序言里十分自信地论断说：“毫无疑问，在激发对于高等教育的性质和目的的思考方面，这部著作比其他任何著作的贡献都大。”<sup>③</sup> 研究纽曼的学者斯瓦格利克（Martin J. Svaglic）在比沙斯特晚一年发行的版本的序言中，称这部著作“雄辩地维护了博雅教育，而这一点，在他所有著作当中，也许是极具持久意义的，在认识上是信仰任何一种宗教和不具宗教信仰的读者最容易接受的”<sup>④</sup>。或者，用扬格（G. M. Young）的话（斯瓦格利克引用过，克尔——Ian T. Kerr 引用得更多）来说：

他运用了他全部的魔力来发挥、精炼和颂扬心智培育（intellectual cultivation）这个概念，认为它本身即是善，本身极具价值，本身就值得赞扬和尊敬，超越了全部知识和全部的专业技能；与此同时，他十分认真地确认了它在道德层面的不足之处以及种种缺点，用宗教来巩固和纯净它的必要性，到最后，我们觉得我们所听到的就是基督教人文主义的终极话语，不再需要重复或者加以补充：似乎伊拉斯谟（Erasmus）焕发的精神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声音。<sup>⑤</sup>

有一篇对牛津的祝酒词（toast），它在描写全部学术秘密的故事中也许算得上是最美丽一篇的开端，它把纽曼和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混合为一：“牛津一向被称为失败大事业之家：如果说为学问

① Smith 1991, 199.

② Dealy 1990, 232.

③ Shuster 1959, 21.

④ Svaglic 1960, vii.

⑤ Quoted in Ker 1976, lxxv, and the final words quoted also in Svaglic 1960, xxvii.

而热爱学问在世界各地都是一种失败的事业的话,那么,就让我们注意,至少在这里,这样的爱能够找到栖身之家。”<sup>①</sup>我已故的友人和同事贾马迪(A. Bartlett Giamatti)在1980年说,纽曼是“19世纪最为细心的和最为强有力的人士之一,是一位深刻思考了教育本质的英国人士”;在1983年,他发表题为“博雅教育的实际用途”的完整演讲,维护了纽曼提出的大学定义。<sup>②</sup>

这本《大学理念重审》在篇幅上近似纽曼原作的九篇演讲,不过本书也多少考虑到维多利亚时代和现代听众的区别,或者维多利亚时代和现代演讲者的区别,因而篇章的数目正好是纽曼著作的一倍;各章标题来自纽曼著作语句(第一次引用时候用斜体字\*)。我的一生都在和纽曼进行一场学术的和神学的对话,这本书的的確确是这场对话的结果。一方面我可以宣称,像纽曼一样(而且也像他一样,是在五十多岁的时候),我体验过数年管理大学的欣喜与失望,不过我也要承认,像他在著作末尾所做的那样,我“不适合完成领导的任务,不适合完成制定规则或者开创事业的任务”(I. ix. 10)。但是,我觉得弥足称道的是,至少是在其他两个方面,我与他之间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学术亲缘关系。像纽曼一样,在几十年之内,我把研究、教学和著述的发表(借用本书第二卷所讨论的范畴)都集中到了一个关键的历史时期,亦即古典和基督教对生活和现实的理解虽然发生冲突却依然汇合为一的那个时期,即东西方教父的时期,这个时期乃是中世纪西方文化和拜占庭东方文化的精神摇篮。而且,在教父中间,占有纽曼注意力的是4世纪的基督教神学家们(他们也继续吸引着我的注意力),这个情况已经见于他的第一本书《4世纪的阿里乌派》(*The Arians of the Fourth Century*, 1833),以后又见于他对三位一体论正统教会第4世纪的维护者、亚历山大城的亚大纳西(Athanasius)著作前后连续四次的编辑和翻译。(我倒也不仅仅是遵从一种与纽曼的学术研究

① Sayers 1935, II (Collancz 1958, 26); see the quotation from Matthew Arnold in chapter 17, below.

② Giamatti 1988, 166—167, 118—126.

\* 为了美观和易于辨识,英文斜体字符译成中文时改成了黑体。——译者注